

国家与社会革命

对法国、俄国和中国的 比较分析

STATES AND SOCIAL REVOLUTIONS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FRANCE, RUSSIA,
AND CHINA

THEDA SKOCPOL

[美] 西达·斯考切波 著

何俊志 王学东 译

东
方
编
译
所
译
丛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国家与社会革命

对法国、俄国和中国的 比较分析

STATES AND SOCIAL REVOLUTIONS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FRANCE, RUSSIA,
AND CHINA

THEDA SKOCPOL

[美] 西达·斯考切波 著

何俊志 王学东 译

东
方
编
译
所
译
丛



上海人民出版社

Shanghai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 Century Publishing Group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国家与社会革命:对法国、俄国和中国的比较分析/
(美)斯考切波(Skocpol, T.)著;何俊志,王学东译.

—3版.—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

(东方编译所译丛)

书名原文:States and Social Revolutions: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France, Russia, and China

ISBN 978-7-208-13071-5

I. ①国… II. ①斯… ②何… ③王… III. ①法国大革命-研究 ②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研究 ③新民主主义革命-研究-中国 IV. ①K565.41 ②K512.51 ③K260.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131805 号

责任编辑 徐晓明

封面装帧 王小阳

国家与社会革命

——对法国、俄国和中国的比较分析

[美] 西达·斯考切波 著

何俊志 王学东 译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o)

世纪出版集团发行中心发行

上海商务联西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635×965 1/16 印张 26.5 插页 4 字数 379,000

2015 年 7 月第 3 版 2015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208-13071-5/D·2702

定价 62.00 元

献给比尔

译者序

本书的英文版初版于1979年。甫一出版,就在学术界引起了极大的轰动,各种佳评如潮而至。我们在该书英文版的封底上就可以看到,查尔斯·蒂利(Charles Tilly)的评论是:“作者以清晰的架构和精细的运思,对三场革命进行了极具挑战性的比较;该书值得研究、批判、检验、深化和争论。”刘易斯·科塞(Lewis A. Coser)的评论是:“我深信,《国家与社会革命》将会被认为是革命起源研究的里程碑式著作。”该书出版的当年,作者就获得了赖特·米尔斯(C. Wright Mills)社会问题研究奖,第二年又获得了美国社会学学会1980年度的杰出学术贡献奖。此后,该书被不断重印,至2003年底,已经重印了28次;其中在1980年、1984年、1985年、1987年、1993年、1999年和2002年还被重印了两次。

迄今为止,在谈及20世纪的革命研究、国家自主性理论和方法论时,该书仍然是一本重要的参考著作,在历史学、社会学和政治学中都有广泛的影响。一本研究法国、俄国和中国革命的著作,之所以能够产生出跨学科的长时段影响,与作者的研究对象、研究方法和研究结论无疑有着紧密的联系。下面,我们主要以革命研究的理论传统为中心,来简要介绍本书所取得的学术价值,以及由此而产生的一些理论上的争论。

一、革命研究的代际更替

革命现象虽然久已有之，但是，对革命问题的系统研究，则在很大程度上是 20 世纪以来才在理论研究中占有重要的位置，并形成了特定的研究传统。我们看到，在对该书所做的各种评论中，大多数评论者都将此前革命研究传统划分为三代，而本书则被看作是第三代革命研究中的里程碑式著作。¹

根据有关学者的归纳，第一代的革命研究，主要以作者在本书的序言中曾经提到过的“自然史学派”的革命研究为代表。这一代的革命研究主要致力于对革命的爆发过程进行描述，持续的时间则大约是 20 世纪初至 40 年代，其鼎盛时期则主要是 20 世纪 20 年代和 30 年代，主要的代表著作有勒庞的《革命心理学》、索罗金的《革命社会学》和佩蒂的《革命过程》等。在研究对象上，这一时期的典型特征是对革命进行个案研究，研究方法则是对革命的过程进行细致的描述，研究的结论一般体现为革命进程各个阶段上的主要特征，最后则总结为各种革命模式。

第二代的革命研究，主要是作者在本书的序言中所批判的三种主要的研究途径。在现代化理论的影响下，这一代的革命研究主要致力于解释各种革命发生的原因，持续的时间大约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至 70 年代中期，主要的代表作品有格尔的《人们为什么造反》、詹森的《革命性变迁》、斯梅尔塞的《集体行为理论》和蒂利的《从动员到革命》等。在研究对象上，这一时期的典型特征是放大了革命的处延，将革命与暴力事件一起研究；在研究方法上，如果说第一代的革命研究主要是一种历史学的研究，那么，在第二代的革命研究中，心理学的挫折理论、社会学的结构功能理论和政治学的利益集团竞争理论都曾经被用来对革命进行研究；在研究结论方面，这一代研究者大有提出某种关于革命规律的“普适性理论”的抱负。

第三代的革命研究，就是以本书作者为代表的结构性途径的革命研

究。这一代的革命研究的典型特征是,结构性视角成了他们的主要途径,持续的时间大约从20世纪70年代中期至伊朗革命这一段时间,主要的代表作包括艾森斯塔特的《革命与社会转型:对文明的比较研究》、佩基的《农村革命:不发达世界的社会运动与农业出口》、崔伯格的《自上而下的革命:日本、土耳其、埃及和秘鲁的军事官僚与发展》和斯考切波的《国家与社会革命:对法国、俄国和中国革命的比较分析》。仅从书名中就可以看出,第三代革命研究在研究对象上的典型特征就是对少量的重大革命进行深入的研究,他们的研究对象既不是单个国家的革命进程,也不是对大量的革命事件进行统计分析。因此,比较-历史分析也就成了他们的主要研究方法。在研究结论方面,这一代革命研究不但试图找出革命的生发原因,而且还试图将革命的进程和革命的后果也统一纳入研究框架之中。

二、本书的四大特色

本书的写作时间是20世纪70年代后期,出版时间是1979年。作为第三代革命研究的晚期著作,在进行研究之前,作者在集中批判第二代革命研究的同时,对第三代革命研究的早期成果也有明显的借鉴和批判。

根据斯考切波本人的归纳,在20世纪70年代以前,流行于美国社会科学之中的革命研究总体上可以概括为三种途径:即聚合-心理学理论、系统-价值共识理论和政治-冲突理论。聚合-心理学理论的典型特征是,试图从人们卷入政治暴力或参加对抗性运动的心理动机的角度来解释革命;系统-价值共识理论则视革命为一种社会系统严重失衡所引起的意识形态运动的暴力反应;政治-冲突理论则将注意力集中于政府内部的冲突以及各种有组织的集团之间为获取权力而展开的竞争。尽管这三类理论在具体的观点和主张上差异巨大,但是,从方法论的角度看,三者之间又极其类似。这三类理论中,聚合-心理学理论和政治-冲突理论的共同点是,都将革命看成是一种特殊类型的政治事件,都试图用政治暴力或集体

行动这类带有极强的普遍性的概念来研究革命。具体而言,前者将革命看成是一种特殊的政治暴力;后者则将革命看成是一种特殊的集体行动。系统一价值共识理论虽然从价值与环境之间出现不协调的角度来解释革命,但同样将革命看成是价值失范之后所出现的集体性暴力行动。在作者看来,如果对这三种理论作进一步的归纳就会发现,这三类理论都可以归结为是一种现代化理论的一个研究分支。这是因为,这三种理论都将革命看成是在社会经济从传统向现代转型的过程中所出现的暂时的、政治与社会经济系统之间的失衡现象。²与此同时,这三种理论都在一定程度上“放大了”革命的概念,将革命看成是集体性的暴力事件。之所以要做这种“放大”,其在理论上的主要目的在于,试图提出一些具有普适性的命题,提出类似于自然科学中的定理那样的普适性的因果解释;其在现实中的目的则在于,找出发生革命的共同原因,以帮助当政者,通过对原因出现的条件实施干预而防止革命的出现。

在作者看来,这三种理论所表现出来的一个极其明显的共同缺陷是,它们在解释革命的产生和发展时,出于提出普适性理论的追求,在各自的理论中都把革命的出现归结为某个单方面的原因,尤其是归结为革命性情绪的传播、相对剥夺感的产生和扩展或价值失范的大面积出现等。这种把革命的原因归结为某种单一的意志因素的做法,就不但忽视了导致革命生发的一系列结构性条件,同时也带有很强的唯意志论和目的论的色彩。

作者据此认为,就研究的深度和可靠性而言,20世纪流行于西方主流社会科学界的革命研究,反而比不上此前的马克思主义。这是因为,马克思主义所重点关注的阶级关系,常常是千姿百态的社会和政治冲突的潜在根源。而且,在成功的革命转型中,阶级冲突和阶级关系的变迁实际上起着非常突出的作用。尤其是农民与地主阶级之间的冲突,明显地存在于一些国家的革命进程之中。因此,在追溯革命产生的根源时,阶级分析是一种不可或缺的基本视角。但作者同时认为,马克思主义虽然强调了阶级关系和阶级冲突的重要性,一些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理论家在进行研究时却过分强调了阶级冲突的重要性。在作者看来,阶级关系和阶级冲突虽然重要,但毕竟只是一种革命所以发生的潜在根源。在从潜在

根源到革命发生的实际过程中,还有一系列因素在其中起着重要作用。如果忽视这些因素所起的实际作用,就很难准确地描绘革命产生的真实画面。作者进而认为,无论是现代化取向的革命理论,还是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理论,都在一定程度上将革命的发生归结为某种单一的原因,因此都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其他的因素在革命过程中所起的实际作用。

针对先前的革命理论中所表现出的唯意志论,作者提出,在历史上,没有一场成功的社会革命是以大众动员和公开的革命运动的方式“制造”出来的。在历史上的革命中,有着不同处境并存在着各种动机的群体,是在错综复杂地展开的多元冲突中成为参与者的。这些冲突又受到了现存的社会经济和国际条件的强有力的塑造和限制。冲突的展开方式,则取决于每次革命形势最初的出现方式。冲突的逻辑并不由任何单个的阶级和集团所控制,而不管这些阶级和集团是否在革命进程中居于中心地位。革命冲突所造成的后果总是既不能充分预测到的,也不是卷入其中的任何一个群体所期望的,当然也不会完全符合他们的利益。因此,在社会研究中,首先要弄清旧制度下革命形势的出现(而非“制造”)的原因。然后,则必须要研究受制于客观条件、以一种复杂的关系相互纠缠在一起的、处于各种情势之下的种种群体行动——正是这些行动的相互纠缠,塑造着革命进程并产生出了新制度。而如果要理解这种复杂性,只有通过同时集中关注下列要素才能如愿:制度性的决定情势、群体之间在社会中的相互关系,以及在世界历史上形成的国际结构中的各个社会之间的相互关系。为了采用这种非个人性的、非主观性的观点——这种观点强调群体和社会之间的关系模式——就需要从一种在一般意义上被称作是关于社会历史现实的结构性的视角出发来进行研究。而如果结构性视角意味着要集中关注各种关系,那么,在各种关系中就必须既包括既定国家内处于不同境遇的群体之关系,也要包括跨国性关系。在追溯法国、俄国和中国社会革命的原因时,作者所考察的结构性的关系包括:传统农业社会中的地主与农民之间的关系、旧制度下的国家政权与支配阶级之间的关系、旧制度下的国家在资本主义经济体系中的地位及其在竞争性的国际体系中的地位。也即,被作者纳入分析视野的结构性的关系包括:阶级与阶级间的关系、阶级与国家间的关系和国家与国家间的关系。

那么,为什么这三个国家在革命性危机出现之后,又出现了差异性的革命模式和革命后果?作者认为,主要的原因一方面在于各国传统农业社会的组织模式的差异;另一方面在于这三个国家所处的国际背景的差异。在革命性危机出现之后,法国和俄国之所以都出现了大规模的农民造反运动而中国则没有出现,是因为法国和俄国农民的自治传统及组织能力,地主上层阶级不能直接控制他们的生产和日常管理;而中国村社自治传统的缺失和地主对农民的直接控制能力的强大,使得农民在帝制政权垮台之后无力组织大规模的造反运动,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中国共产党在农村中将他们组织起来。在革命的后果方面,法国革命之所以为资本主义的发展开辟了道路,俄国革命则导致了一党专政式的无产阶级革命,主要是因为,在俄国革命时,俄国的工业革命已经粗具规模,为国家推动的强制工业化提供了基础;而列宁主义式的政党在组织技术上,也因为大工业和铁路运输的发展而能够对工人阶级进行大规模的动员。中国革命虽然师法俄国革命,但是在社会基础方面又更加类似于革命时期的法国,所以,中国的革命精英虽然从俄国学习了新型的政党组织技术,但同时却面临着小农经济的汪洋大海。在革命之后,中国虽然也走上了国家推动工业化发展的道路,但并没有像俄国那样发展出官僚主导的政党国家,而是一个更具有大众动员色彩的政党国家。

由此也就引出了作者在本书中所强调的国家的潜在自主性问题。作者提出,国家是一套以执行权威为首,并或多或少是由执行权威加以良性协调的行政、政策和军事组织。任何国家都要首先并主要是从社会中抽取资源,并利用这些资源来创设和支持强制组织和行政组织。因此,行政组织和强制组织则是国家权力的基础。如果我们把国家看成是一套以行政和强制为基础的组织体系,那么,国家在任何地方都具有摆脱支配阶级直接控制的潜在自主性。但是,国家在实际上所具有的自主性的程度,以及潜在自主性所产生的实际影响,则因具体的场景而异。从国家的潜在自主性出发,作者进而提出,追求更大自主性的国家,必然会在一定程度上与支配阶级进行某种竞争。这是因为,国家是一种依赖于从社会中提取资源并进行分配的组织。一旦这些资源被提取出来,这些资源所投向的目标可能会偏离现存支配阶级的利益。而且,这些资源可能大部分都

会用来强化国家自身的自主性——这就必然会威胁到支配阶级的利益。正如马克思所言,国家的首要职能是维持既存的政治秩序,而维持既存政治秩序的最便利的途径,就是维护现有的经济结构和阶级结构。但是,国家在维持既存政治秩序的同时,也会追求自己的利益。因此,国家与支配阶级之间在共同维护现有的阶级秩序方面具有利益的一致性;但国家在追求自身利益时,又与支配阶级之间存在着出现冲突的潜在可能性。与此同时,由于任何国家都在特定的地缘政治内与其他国家之间处于相互作用的过程之中,地缘政治环境既为国家创造了任务和机会,同时也限制着国家应对国内外的任务和危机的能力。因此,革命的分析者不但要考察阶级关系,而且要考察国家之间的关系,以及国家对支配阶级和被支配阶级的关系。本书在考察各国的革命性危机时,也主要集中分析了国家与外国军事竞争者、与国内的支配阶级和现存社会经济结构的关系。

在对革命进行研究,尤其是对社会革命进行比较研究时,在研究方法上所遇到的一个独特的问题是,由于社会革命是一种大规模的社会运动,这种社会运动在数量上并没有大到可以进行统计的地步;与此同时,在特定历史背景下所爆发的社会革命也并不具有可重复性的特征。因此,统计和实验的方法很难适用于对社会革命的研究。这就给社会革命的研究者们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如何在既不采用数量统计,又不是单纯的历史叙事的同时,能够提出一套因果解释模式,从而使得社会革命的研究能够符合社会科学的规范性要求。作者认为,解决这一问题的途径就是采用比较-历史分析的方法,在各国历史轨迹中选取一些片段来作为比较的单位,从而为那些本身只有少数案例的宏观历史现象作出解释。那么,如何通过比较-历史分析来提供科学的解释呢?作者在本书中大致通过了两种途径来实现这一目的。第一是,在案例本身不是太多的情况下,基于社会革命本身的复杂性,可以采用多变量的方式寻找多个案例背景的共同原因,即求同法。第二是,通过与反例的对比,来进一步确证求同法所得出的结论。在本书中,作者一方面通过求同法来寻找导致法国、俄国和中国革命性政治危机的条件;另一方面,又通过与没有出现社会革命的英国、普鲁士和日本的对比,进一步确认了求同法所得出的结论,同时也为反例提供了解释。正反对比的结果,作者实际上也就解释了六个国家的

发展模式，并基于这六个案例而发展出了一套革命理论。

三、对本书的各种批评

在作者看来，结构性视角、国际与世界历史的背景、国家的潜在自主性和比较-历史分析的方法，是本书的四大特色所在，也是本书相对于先前的革命研究的突破之处。这种突破刷新了社会科学的革命研究传统，也引起了各方面的讨论。根据译者的有限阅读，相关的讨论主要围绕着三个方面展开，即结构性视角、国家的潜在自主性和比较-历史分析的方法。

基于结构性视角，作者在本书所提出的一个著名的论断就是：革命是发生(happen)的，而不是制造(make)出来的；革命并不起始于革命先锋队的主观努力，而是发生在特定的结构性情势之下。社会革命是多种社会力量在某一历史时刻复杂交织的后果。革命的最终后果超出了任何单个参与主体的意图。相对于先前的理论追寻革命生发的单方面原因而言，这种结构性视角当然是一个巨大的进步。但是，正是由于作者对这种结构性的作用的强调，引出了所谓的结构性与能动性的争论。在一些学者看来，斯考切波的结构视角无异于是一种机械的结构决定论者。有学者认为，这种机械性的结构决定论的典型表现就是，作者在研究法国、俄国和中国革命时，在相当程度上忽视了一些革命领袖人物在革命过程中所起的重大作用。例如，在研究俄国革命时，对于在俄国革命过程中起着重要作用的托洛茨基，斯考切波就只是轻描淡写地提到了两次。³有学者甚至提出，社会结构只是为革命的成功创造了条件，但如果革命者是一帮很平庸的人，革命照样不会成功。⁴除了从革命者的能动性角度进行批评外，还有一些学者则提出，即使从结构性视角出发也应该注意到，在一系列导致革命生发的原因中，各种力量所起的作用也并不完全一样。而斯考切波在对社会革命进行考察时，只是强调了各种力量在某一历史时刻的“接合”(conjuncture)导致了社会革命的生发，而对于在各种力量走

向接合过程中起主导作用的某些因素则明显重视不够。例如,斯威尔(William H. Sewell)就通过对法国革命的考察而提出,斯考切波在研究法国革命时,严重忽略了意识形态在这一过程中所起的重要作用。正是由于对文化和意识形态的这种忽视,使得斯考切波的著作就无法解释这种现象:在任何重大的革命之后,我们都会看到,一套新的文化系统取代了旧的文化系统。⁵

对作者的批评比较集中的第二个领域是国家的自主性问题。斯考切波在本书中所提出的国家有着自身的结构和性质,以及与这些结构和性质相对应的利益和行为方式的观点,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国家理论在当代社会科学中的复兴。就在本书出版不久,作者还与伊文斯(Evans)和罗斯齐美尔(Rueschemeyer)共同推出了《重新回归国家》一书,从而使得作者在这一时期又成了著名的“回归国家学派”或国家中心论的重要代表人物。与此前所盛行的社会中心论相比,国家中心论的突出观点就是,强调不能把国家简单地看成是利益竞争的公共舞台、竞争性力量的裁判或支配阶级的工具,国家具有追求自己的偏好和利益的性质,它能够一定程度上依照自己的偏好、按照自己的行为方式来贯彻自己的意志。20世纪80年代以来,回归国家学派不但在解释日本、土耳其、埃及和伊朗等国的政治发展方面产生了重要影响,而且在解释东亚和拉美的经济发展方面同样声誉卓著。这些研究的一个共同特点就是,强调国家及其官员在推动社会经济现代化过程中的重要作用。应该说,斯考切波在本书中所重点阐述的国家具有自主性的观点,是被大多数学者所接受的。而且,她同时强调的国家自主性的强弱因环境的变化而变化的观点,也具有相当的说服力。在革命研究中,斯考切波所受到的批评,主要来自于她在国家自主性与国家能力的相互关系的处理上。除了强调国家具有自主性之外,作者在分析社会革命爆发的原因时还提出了这样一个观点,即传统的君主官僚制国家是一种自主性强的国家,但是,由于受制于竞争性的国际环境和农业社会的阶级结构,国家能力较为虚弱。正是由于一系列的结构条件所导致的国家能力的这种虚弱性,使得君主官僚制国家在面临内外压力时,不能有效动员相关资源来贯彻自己的意志,从而走向解体。但是,大卫希斯(Evenly B. Davidheiser)通过对瑞典、德国和

俄国的政治转型的研究提出,在从传统国家向现代国家转型的过程中,并不是像斯考切波所说的那样,是传统国家的虚弱才导致了革命的发生;相反,正是在那些传统国家的国家能力过于强大的地方,才更容易出现革命。为了阐明自己的观点,大卫希斯进一步将国家能力的强弱细化为两个指标,即国家穿透(state penetration)社会的深度和广度。强国家意味着国家对社会的穿透既深且广。与此同时,强国家就意味着社会对国家的穿透很弱,社会的利益和需求不能渗入国家。在广泛而深入的国家穿透过程中,由于执行着穿透任务的各种制度和机构目标并不完全一致,尤其是那些在具体目标上存在差异的机构之间,出现冲突的可能性就会大大增加。⁶

有学者则进一步提出,由于斯考切波过分强调了国家的自主性,并主要是以国家为中心来分析革命的原因和进程,从而也就有意无意地过分强调了某些因素而忽视了本来应该很重要的因素。例如,在她所提出的要加以分析的三对关系:即国家与国家、国家与地主上层阶级和地主与农民的关系框架中,明显忽视了城市工人在革命过程中所起的重要作用。尤其是对于法国革命和俄国革命而言,城市工人在革命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是显而易见的。与此同时,在分析1789年波旁王朝所面临的财政危机时,她也过分强调了军事竞争所引起的支出的增加,而没有充分注意经济衰退所引起的收入的减少。因此,斯考切波所列出的国外军事压力、国家与上层精英间的冲突,以及地主和农民之间的矛盾,也就不足以充分解释1789年法国革命的原因。⁷

本书所受到的第三个方面的批评,则主要针对作者所一再强调的比较历史分析。布拉俄伊(Michael Burawoy)通过对斯考切波所使用的求同法和求异法这一逻辑推理结构进行整理后发现,作者在推理的过程中存在着一个明显的缺陷。这是因为,当作者在运用求同法来研究法国、俄国和中国革命政治危机的共同原因时,重点考察的是三对关系:国家与国家间的竞争、国家与上层精英间的矛盾,以及农民的团结和自主化程度。在这三对关系中,这三个国家同时满足的条件只有两对,即国际军事竞争所引起的危机和由农民的团结和自主所导致的反叛。在国家与上层精英的矛盾方面,法国和中国满足这一条件而俄国不满足;在农业的资本主义

发展方面,法国满足、俄国和中国都不满足这一条件。因此,共同的原因应该是国际危机和农民的团结导致了政治危机的出现。但是,当我们运用求同法的结论去考察1640年的英国革命和1848年的德国革命时,却发现无论是在国际军事危机还是农民的团结方面,这两个国家都不满足这一条件(唯一的共同之处是实现了农业的资本主义转化),但是,这两个国家却都出现了政治危机。⁸因此,一些学者进一步批评,作者在使用比较历史分析之时,存在着机械地将同一推理体系强行套进具有不同历史传统和权力结构的国家的倾向。正是由于这一倾向的存在,使得作者在一些地方表现出了某种凝固的历史观。例如,赵鼎新就指出,作者在分析中国共产党的农村动员时,动员的对象仍然是晚清时期的农村结构。⁹

四、争论的发展与第四代革命理论的出现

面对来自各方的批评,作者在捍卫自己的某些观点的同时,也对自己的某些观点实施了一定的修正。正是在这种捍卫与修正的过程中,一方面使作者自己从一个国家中心论者转向了历史制度论者;另一方面,在作者的影响下,本书在分析框架方面所具有的一些开放性特征,也促成了一批新的学者在此基础上逐渐开创了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的第四代革命理论。

在当代社会科学研究的主要流派中,尤其是在对其结构性视角的批评方面,我们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将对斯考切波的上述批评归结为两个方面:理性选择理论的批评,认为作者忽略了人的理性,尤其是大人物的理性能力在革命过程中的重要作用;文化理论的批评,认为作者忽略了在革命过程中主导着人们的认知模板和话语体系的意识形态的重要作用。而斯考切波本人的回应,也显然主要针对这两个方面展开。针对前者的批评,斯考切波提出,她的研究与理性选择理论之间事实上存在着某种共性,因为,她并没有否认行动者的选择在事件发展进程中的作用。但是,她与理性选择理论之间同样存在着距离。这种距离表现在:理性选择理

论常常强调的是个体的理性选择能力，而在诸如革命一类的重大事件中，重大的行动却常常是由群体或组织所作出的；在以群体和组织为集体行动单位的地方，个人的选择和行动能力无疑要受到他人和组织规则的塑造。与此同时，理性选择理论常常关注的是既定制度之下的某个时间点或者某一具体事件中的理性选择与行动问题。在某一具体的时间点或具体事件中，个人的选择和行动常常是非常突出的。但是，一旦我们在考察某一长时段事件的前因后果时，就必须更加关注结构性要素。¹⁰ 作者进一步提出，相对于文化论者而言，结构性视角的研究反而是更加强调由行动的主观意志所导致的能动选择与行动。因为，意识形态自身并不能在革命过程中发挥作用，它必须要经过相关群体的再加工之后才能发挥作用。在任何一个社会的革命情势下，常常是多种意识形态共存于一体。处于不同地位的参与群体都会利用自己的意识形态来界定相应的情势并做出选择。而且，在当代世界所实际发生的革命运动中，在某些场合，例如在法国革命、俄国革命和伊朗革命中，政治冲突和组织体系本身就为意识形态的再加工提供了较大的空间，意识形态的领袖也能够在相当程度上利用意识形态来动员群众投入政治运作。而在另外一些革命运动中，例如在墨西哥革命中，政治冲突主要表现为军队在农村中的冲突，并没有为观念的加工和传播提供多大的空间，因此意识形态的作用也就并不明显。所以，没有任何一种文化体系能够成为我们理解革命的万能钥匙。¹¹ 作者虽然在这里仍然坚持理性和意识形态发挥作用的结构性条件，但实际上已经为理性和意识形态的功能留下了空间。而且，甚至早在1982年，基于意识形态在伊朗革命中的重要作用，作者就已经将她的社会革命概念进行了修正，将社会革命的概念从“国家和阶级结构得到快速而根本的改造”修正为“国家、阶级结构及其支配性意识形态得到了快速而根本的改造”。¹²

作者的这一回应表明，她试图在长期争论的社会行动的结构性与能动性(structure-agent)之间作出某种调和。这种调和不但反映出了作者所继承的两个大的理论传统之间的内在张力，同时也为相关理论的发展提供了讨论的基础。正如有学者所清楚地看到的那样，本书的作者受托克维尔的影响非常之大。这种影响不但表现在作者的国家中心论立场和

一系列术语都非常类似于托克维尔的《旧制度与大革命》，而且也在无意中传递了作者试图在新的时代背景下扩展《旧制度与大革命》的伟大抱负。在一定程度上，我们甚至可以说，《国家与社会革命》就是一本20世纪的《旧制度与大革命》。但是，与此同时，作者又受到了马克思主义，尤其是新马克思主义的深刻影响。作者从她的老师摩尔那里明显地继承了马克思的阶级分析方法，而且非常注重生产关系为政治危机的出现所提供的结构性条件。¹³但是，马克思主义在分析革命的爆发时，除了强调结构性条件外，还强调一个重要的因素，即阶级意识的觉醒。在本书中，正是由于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理论所具有的这一特点，与作者的取向拉开了距离。因为在作者看来，强调阶级意识的做法与20世纪70年代的主流革命理论一样，都是一种意志论。而当本书过于强调结构论的做法引出不少的批评之时，作者的回应又开始为主观意志和意识形态留出了一定空间。

那么，作者是如何调和这种结构论与意志论，或者说结构性与能动性之间的内在张力的呢？作者在本书中所使用的“接合”(conjunction)一词无疑扮演着重要的作用。简而言之，“接合”或者如另外一些类似学者所使用的“关键接合点”(critical conjunction)，是指这样一种历史时段：在这一时段上，一系列分散的因素开始结合到一起并相互作用，从而产生出了具有分水岭作用并设定了下一阶段历史路径的重大事件。那么，各种因素到底是怎样在某一历史时段上“接合”到一起并产生出革命性政治危机的呢？80年代以来的第四代革命研究者们研究，就明显带有与《国家与社会革命》对话的性质，而在对话的同时则明显地采用了上述的“接合”分析的框架。根据弗兰(John Foran)的归纳，第四代革命研究的主要代表性著作包括：阿米尔的《为国王所包的头巾：伊朗的伊斯兰革命》、詹姆斯的《革命与革命性运动》、高尔德斯通的《早期现代世界的革命反叛》和高德温的《中美洲的革命性运动：比较分析》等。第四代革命研究者们所关注的对象，仍然是革命所以发生的原因。但是，与第三代研究者不同的是，他们试图超越第三代研究者们过分强调结构性条件和某些结构性因素的限制，而试图将经济、政治、文化因素，以及各种因素的内在构成和机制结合起来进行更为深入的分析。因此，第四代革命研究者们处理的